

#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6~17

2016年12月16日

\*\*\*\*\*

## 周边的中国 —— 文化共同体的社会史初考

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 黄晓京

我坚信，倘若F. 布罗代尔依然在世，他会以极大的好奇注视今天的中国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布罗代尔持论正确，中国人会以独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sup>1</sup>

### 一、引子：什么是周边的中国

1880年11月20日，琉球国王密使林世功（1842~1880年）在北京的总理衙门前自刃殉国。1868年，世功留学北京国子监，归国后任“国

---

<sup>1</sup>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译本，〈序〉（布罗代尔夫人作），商务印书馆2013年。

学大师匠”世子之师。1876年，当琉球国面临明治日本吞并危机时，受命来中国求援。五年时间，世功东奔西走上下陈情，请求中国助以援军，拯救亡国危机。在听说清朝和日本签署条约分割琉球之际，他彻底绝望。他的遗诗“一死犹期存社稷”，他的社稷还是亡了。尽管因左宗棠1881年当了军机大臣行走总理衙门干预此事，分割案一度作废，也无力回天。明治日本废藩置县，1879年并琉球为冲绳，命末代国王尚泰移住东京，封了一个侯爵，1901年病逝，一说被毒杀。

世功之死，震撼官场，感其忠义者集资（一说慈禧·朝廷赐银）二百两，葬之于通州张家湾立禅庵村。曹雪芹也有葬于张家湾之说。明代以后，琉球的贡船照例停泊泉州，贡使一般沿运河北上，在张家湾登岸。康熙时代或许更早，那里就有琉球国墓园。9·18以后一度以其为日本人被毁。林世功祖先为福建人，琉球有所谓“久米三十六姓”，据称1392年洪武下令，闽人学者、工匠、船师移民琉球，定居久米村，此后政治家和学者辈出。事见18世纪琉球的《中山世谱》记载，却不见于中国史籍。古琉球语接近闽南语，官方文字是汉字。

在林世功眼里，在琉球国眼里，中国是什么？早在1609年，日本萨摩藩以武力攻琉球，俘虏了国王，逼写誓文强制上贡，琉球被迫“一国两属”，并对中国隐瞒了实情。明治日本效欧式民族国家，挑战中国~周边传统秩序，1879年册封琉球藩王，世功不认可其合法性。几百年来，中国册封琉球，琉球朝贡中国，名正言顺。其他周边也是如此。册封朝贡代表那个时代中国~周边的国际秩序。周边虽称藩属，却是独立的，非中国殖民地，并共同参与亚洲和国际贸易。朝贡制度历史悠久，随着中国概念的周边扩大，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演变为15~18世纪的朝贡贸易体系（tributary syetem）。周边有事，和林世功一样，可以来中国投诉。秦汉以后安南为中国郡县，宋以后逐渐独立，册封朝贡。明初，安南权臣外戚胡季犛推翻陈朝，建立胡朝，前朝的后人来明廷投诉，

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1406年，永乐派兵护送该王孙回越南，被胡朝杀害，激怒永乐兴师讨伐，1407年郡县其地，设立布政使司。那一年郑和航海时，“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讟，来者日多”。<sup>2</sup> 1418年，反“北属”的黎利发动蓝田起义，屡败明军，1424年永乐去世，明朝撤兵后封黎氏为“安南国王”，恢复朝贡关系。1430年郑和第七次航海，或有抵消安南事件影响之意。

在南海问题上起诉中国菲律宾，以西班牙国王的名字命名的民族国家，原来曾有朝贡中国的苏禄国。1417年，苏禄国三王率三百余人来朝，东王归途病故，安葬德州，“长子都马舍归国袭封，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留居守莹”。如此说来，山东德州回族的“安”“温”两姓，当为苏禄东王后裔。到1753年（乾隆19年），“苏禄国王麻喊味安柔律噶遣使贡方物，并贡国土一包，请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帝谕，苏禄国倾心向化，其国之土地人民即在统御照临之内，毋庸复行贡送图册。28年，国王遣使贡方物。自后遂不复至”。<sup>3</sup> 乾隆28年即1763年，那一年曹雪芹逝世，苏禄使臣最后来朝，“后遂不复至”，西班牙已经殖民扩张到那里，中国和菲律宾的朝贡关系中断。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R·拉塞尔（Daniel R. Russel）信口开河：“亚洲国家很容易因为大国的举动感到焦虑，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过去一千多年时间里，他们已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sup>4</sup> 此言用之于过去五百年西方殖民地可也，用之于中国似不通。乾隆拒绝苏禄“编入中国图籍”，不以领土为度，何来千年焦虑。

世功为保全自己的社稷以死相拼，结果是悲剧性的。不仅琉球，中

---

<sup>2</sup> 《宦官列传一·郑和》，《明史》卷340，中华书局。

<sup>3</sup> 《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五，属国三，缅甸、暹罗、南掌、苏禄。

<sup>4</sup> David E.Sanger: 〈美国转向亚洲后，亚洲国家担忧什么？〉《纽约时报》2016年5月24日（<http://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60524/c24asia/>）。

国周边各国皆在 19 世纪被殖民化，中国~周边秩序“历史终结”。明治日本“脱亚入欧”，效法西方列强，挑战暧昧的朝贡体系的“宗属关系”。1894 年甲午之战，是东亚史的转折点，也是东亚民族国家兴起、朝贡体系崩溃的标志性事件。清朝以保护属国出兵戡“东学党”之乱，日本以保护侨民条约为由出兵，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抓住“宗属关系”和独立国家的矛盾，不管袁世凯如何用计调节，就是不撤兵，最终一场中国落败的战争。陆奥宗光将双方的立场归结为，“一方代表西欧的文明，一方要保护东亚的旧习……是西欧的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sup>5</sup>与甲午战争相比，林世功之死是一个小事件，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不过，这个事件具有某种历史的延伸性，它意味着那个时代中国秩序的终结，也意味一种周边中国的信仰终结。

许多历史事件往往瞬间爆发，其烟雾却可能令人迷惑不解，看清真相要在很多年之后。林世功之死，因果关系早已被遗忘，连带着琉球的属国史，但那股烟雾似乎至今仍未完全散去。2015 年，日本经济代表团会见李克强总理，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在座，发言提及被人忘却的琉球国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令不少在场的日本人大为惊诧——当时就美军基地的转移问题，冲绳正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此君言论有独立或朝贡中国之嫌。暧昧的朝贡体系是历史的失败者，是不平等的、前近代的、傲慢的“中华秩序”。1793 年，马嘎尔尼朝见乾隆成为一个象征性事件，象征中国的无知的傲慢。2011 年，日本民主党领袖小泽一郎率一个 150 名议员代表团来北京访问，被称之为“复活朝贡外交”，间接导致了日本民主党不久之后的下野。

日本的反中国体制或秩序，主要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隋唐以至于明代，日本参与朝贡，虽然没有琉球、朝鲜那样频繁。唯一的挑战者是丰臣秀吉（1537~1598 年）。1592 年，他曾率 16 万人的大军侵略朝鲜，

---

<sup>5</sup> 陆奥宗光：《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秘录》，徐静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明军和朝鲜共同抗敌。这场“壬辰战争”持续六年，秀吉惨败而归，次年病歿。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入，再到林世功死去的时代，中国——周边的朝贡体系是唯一的亚洲体系，并维护了东亚世界的和平秩序。

明清的朝贡地在北京。汉代之后的外交机构叫鸿胪寺，元代称会同馆，明清之后仍称鸿胪寺，并设会同馆。从永乐时代起，北京原来的燕台驿、乌蛮驿升格为会同馆，除了提供住宿，使团可以在此开市贸易。紫禁城建成之后，两个会同馆也完成，一个在东江米巷为南馆，一个在澄清坊大街为北馆，皆离皇宫不远。北方建州、海西，西方吐鲁番、撒马尔罕、哈密等来使安顿在北馆，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安顿在南馆。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出使日记《初渡集》，有“玉河馆”之名，时间是1540年（嘉靖19年）3月2日，他们从张家湾出发，“申刻，入京。从崇文门而入，日本二十丁（六丁为一里）余而就玉河馆”。该馆当在北京古老的玉河边上，玉河在1918~1956年间逐渐断水，后改为暗渠，最终填埋，现在皇城根儿附近部分修复。按朝鲜来使的记载，该馆为会同馆的别称：“京师乃四夷朝贡之地。会同馆之外，又建别馆。臣等所寓之馆在玉河之南，故亦号玉河馆”。<sup>6</sup>朝贡之礼皆有定制，使臣可在“习礼亭”研修朝见礼仪，朝见在每月的阴历16日的早朝。这出历史戏剧反复上演，演绎一个周边的中国。

## 二、周边的中国是理解中国的一个关键

周边的中国，一个超越民族、疆域、习俗、语言的文化共同体。欧洲的中心和周边，历史上也存在类似的纳贡关系，但区别却是显而易见。

---

<sup>6</sup> 朱莉丽：《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里的明代社会》，第三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6~160页。

研究中国，需要一个周边的视角：“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sup>7</sup>

古希腊、罗马建立的欧亚帝国，以武力征服地中海为自己的内海，总督统治周边民族。罗马的“公民”(civis)社会演化为文明(civilization)，附属的各个民族不是罗马人，纳贡臣服却很难成为“公民”，自他之别严格，并被罗马法律所规定，成为国际法。君士坦丁时代帝国基督教化，要普世到世界一切角落，与现代的民主宗教一脉相承。周边的异族入侵，打击了罗马世界。1452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所灭，当时欧洲诸国四分五裂，无力应对这个挑战。教会曾为欧洲文化的统治者，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承断裂。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以回归古典的方式重建文明，但难说近代欧洲是古希腊罗马的继承人。中国的文明是连续的，而且中国者，周边之中国，其疆域不单依靠武力扩张，而是随着自己文明的周边扩大而扩大，从河洛中原的中国，到周边的中国，中国概念也从地域概念演变为一个超疆域的、多民族的共同体概念。这个共同体还包含了农耕~游牧的他者共存，多次经历外族入侵，却蛮夷亦中华。布罗代尔从长时段、整体性的历史观出发提出，周边的中国是理解中国的关键。

从中国立场看和世界，与从欧洲和立场看中国，会存在“视觉差异”，并造成认知误区。古代欧洲人对于中国~周边所知甚少，“遥远的赛里斯国”；近代欧洲也不理解什么“藩属关系”，因为与他们的传统不同。中国人将欧洲视同蛮夷，对近代欧洲的体系缺乏认知，那是一个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民族国家的政治、条约体系的国际关系，一个体系化的国际秩序。在东西方关系领域，历史学家耕耘多年，就个别事件、人物和某个时段的经验中，追求整体性的历史意义。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和社会

---

<sup>7</sup>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年，第117页。

会学相近，二者皆是整体性的，只不过一个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现在，在社会时间的意义上，过去和现在是连续的。狄尔泰的所谓历史、经验和哲学的三位一体，以及对关注历史的“发生学”，同样追求历史的整体意义。<sup>8</sup> 沃勒斯坦的整体认识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主体并非民族国家，而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构成的复合体，即“现代世界体系”，它发源于“延长的 16 世纪”欧洲（1450~1640 年），是一个具有中心、半边缘、边缘构造的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sup>9</sup> 中国~周边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

文化维度中包括宗教，欧洲秩序和宗教关系密切。基辛格说，“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当今时代的所谓秩序，源于近四百年前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一次会议”。<sup>10</sup> 欧洲的宗教背景的 30 年战争，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和新教诸侯讲和，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承认各国的主权独立，初创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1648 年）。经济维度是中间等级的兴起，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海外冒险，民族国家主导的东西方贸易。马克思早年追究资本主义的起源，认为 1648 年的英国革命、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欧洲新社会的诞生，这两次革命“并不是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源，<sup>11</sup> 而在《资本论》中他又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 16 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sup>12</sup> 在某种意义上，资本的原动力源于国际舞台，主要是东方，是亚洲。珍妮特·阿布将 13~14 世纪“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描述了一个多元的社

---

<sup>8</sup> 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颜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

<sup>9</sup>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 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罗荣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sup>10</sup> 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 2015 年。

<sup>11</sup> 福勒：《马克思和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56~58 页。

<sup>12</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四章。

会空间和结构，<sup>13</sup> 滨下武志则将 15~18 世纪的中国朝贡（贸易）体系作为唯一的亚洲体系，并指出，正是这个亚洲体系推动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sup>14</sup>

中国的朝贡关系对民族国家的平等关系，<sup>15</sup> 是费正清对国际关系二元对立的经典概括，延续着黑格尔以来历史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黑格尔看到的“新世界”只出现于欧洲，非欧洲世界只不过犹如盲人突然得了视力，看见了灿烂的阳光而已。印度和中国远未获得自我意识，停留在非历史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国家具有客观理性，但对于属于精神的一切——心灵、宗教、道德、科学和艺术——却格格不入。<sup>16</sup> 此后，韦伯提出自己“世界史问题”：“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涉及“资本主义精神”，也涉及经济和政治结构。<sup>17</sup>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福山轻率地宣布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历史终结”，他属于黑格尔派。20 余年过去，历史并没有终结，他自己也在反思“历史终结”之后的历史。资本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现在正陷入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带来思想的迷茫，资本的全球化和民主主义并非灵丹妙药。美欧日“三家村”各有自己难念的经，反恐战争、颜色革命带来持续战乱，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制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袭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感觉得到这个体系的动荡甚至失序。一位历史学者这样写到：“我们非但不是在见证历史的终

---

<sup>13</sup>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 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sup>14</sup>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sup>15</sup>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sup>16</sup>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sup>17</sup>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翻译林出版社 2011 年。



结，而是正在退回历史的起点。过去 25 年，全世界最突出的特点可能是自由民主的退却，它曾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但辉煌的往昔如今也成了遥远的记忆。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一直到中国的太平洋沿岸，这些横跨在欧亚大陆脊柱上的国家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差异。它们共同之处在于，其治理制度更接近于传统的宫廷体制，而不是民主制度”。<sup>18</sup>

这样的认识和预测，一定会得罪许多“历史终结”的追随者。可是很显然，没有历史预测，便没有历史科学。认识主体的预测从来都是冒险的，却可作为客观历史的方向性假设。延续了几百年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可能开始“重组”（restructuring），并意味着一个长期的历史开始。变革的具体途径，是一个实践的课题。世界体系兴起时代便存在其对立物，亚洲唯一的朝贡体系是其中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新文明曾在这个旧体系之下成长。历经曲折，中国~周边现在以自己方式发展，并参与到这个体系的历史性重组。马丁·雅克写到，随着中国的复兴，它将重申与邻国之间古老的附属关系，当年改变它的外部条件日渐消失和减弱之后，该地区将重新围绕在中国周围，“我们完全有可能看到，朝贡制度的某些部分在现代背景下的回归”<sup>19</sup> 问题在于亚洲何以如此，以及以何种现代形式“回归”。过去和现在，结构上的类似性常常导致历史的反复。过去，世界体系利用并超越亚洲唯一的朝贡体系，实现欧洲体系的全球化；而今，世界体系自身在走向衰败，其替代物尚未出现，但中国和亚洲的再兴可能意味着另一次超越，一种边缘的文化革命。

现实的中国~周边并不安宁。东北亚、东海、南海不断有事，这与

---

<sup>18</sup> 彼得·弗兰科潘：〈历史走向终结还是回归起点？〉，FT 中文网评论，2016 年 04 月 13 日。

<sup>19</sup>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 2010 年。

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变革相关。亨廷顿早就断言，“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 21 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sup>20</sup> 奥巴马早就提出了“回归亚洲”“再平衡”中国的战略，棋子是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越南，以及排除中国的 TPP。现在看来，美国战略回归力不从心，前景暗淡，而那些战略棋子过去曾是朝贡体系“东亚世界”的成员。

### 三、朝贡贸易体系是唯一的亚洲体系

15~18 世纪，唯一的中国~周边的朝贡贸易体系，刺激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从印度洋到中国海，欧洲的民族国家用不着“创造”什么贸易网络，国际贸易网络已经存在多年。他们只是改变规则，以新规则取代了旧的。而且，世界体系的新规则也不是一下子建立的，东西方贸易曾一度在朝贡体系的旧规之下展开，并为中国~周边自身走向近代的一个“国际契机”。<sup>21</sup> 换言之，近代化有一个中国和亚洲自己的起源。

为解释亚洲复兴的历史因缘，吉普鲁花了 20 年研究亚洲港口，写成《亚洲的地中海》。“亚洲地中海”在狭义上指中国南海，而在广义上则指从海参崴、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直到新加坡的辽阔海域和地域。直到 16 世纪晚期，这个辽阔海域以朝贡贸易为中心，其发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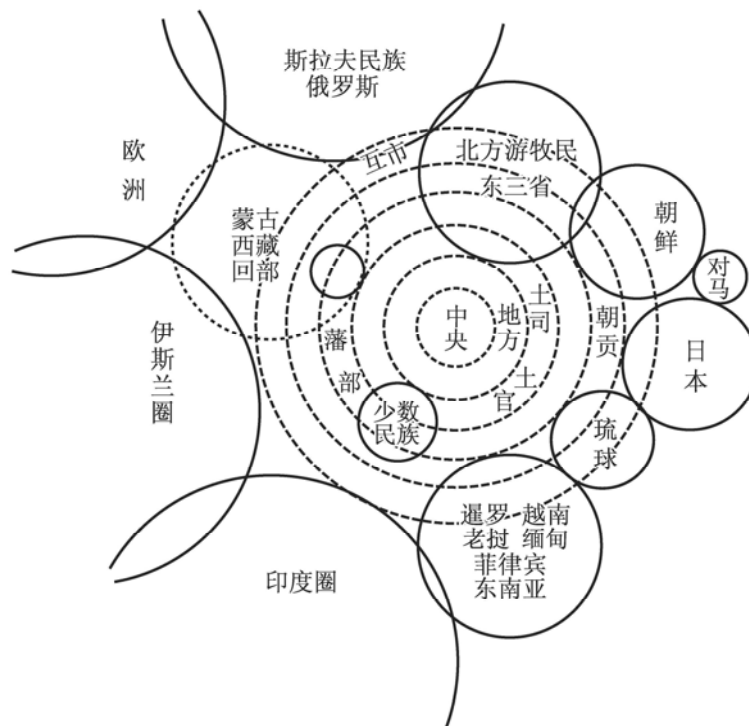
<sup>20</sup>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10 年。

<sup>21</sup>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程度类似地中海世界。<sup>22</sup> 通过“亚洲地中海”，中国与印度洋、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相互连接，扬子江地域以南的海洋中国，一直是主要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

1990年代，滨下武志提出朝贡体系概念，指出15~18世纪的朝贡体系，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第一次全球化。这个体系是中国原产，国际贸易在这个体系下发展：中心~周边（或中央~地方）形式，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构成按中心~周边关系的同心圆交错一种多极体系；这种体系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形成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网络性的国际秩序。<sup>23</sup> 从下面他的作图来看，朝贡体系的国际秩序，以同心的朝贡圈和多元的外围并存，一直连结到达阿拉伯、地中海东岸（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和欧洲。

图~1：中国与周边关系（以清代为例）



<sup>22</sup> 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sup>23</sup>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一章，图1~2。

滨下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迄今为止，亚洲的近代史，都是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进行说明的，对这种分析视角在方法上的反思，应当是现在需要寻求的课题”。<sup>24</sup> 在方法论反思的同时，他利用各种史料分析了朝贡贸易圈的各个方面，诸如亚洲地域内的商品交换、连接内外各个社会的交易网络、贸易中心、汇兑渠道，以及在与外部社会进行交换时，亚洲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动向如何受到制约，日本工业化的发生如何与朝贡体系相关等。关键在于，世界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属于政治性体系；而朝贡体系则是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性关系，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系。西方世界体系本身有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可能用东亚历史的经验研究东亚，而且是否有可能去研究西方。<sup>25</sup>

这种亚洲主体的方法论和区域研究，与日本的东洋史学，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的“唐宋之变说”有着内在联系。内藤认为，秦汉为上古，东汉到两晋为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为中世，唐后期到五代十国又一个过渡期，宋则为“近世”（early modern）：唐宋之际，举凡交通（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部，运河沿线，沿海）、经济（农业，商品经济，市场货币经济）、政治体制（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文化思想的变迁，使得宋代中国进入与欧洲中世绝然不同的“近世”。<sup>26</sup> 这个假说一经提出，刺激了国际学界的一系列探究和争论，诸如宋的商业组织、唐宋的城市研究、乃至中国的“文艺复兴”论，核

---

<sup>24</sup>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sup>25</sup> 滨下武志：〈从朝贡体系到东亚一体化〉，共识网 2010 年 12 月 13 日。

<sup>26</sup> 内藤湖南：〈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论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 1993 年。

心是通过历史和实证追究近代的亚洲起源,从中国找到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范式。梁启超很早就推荐过“中国近世”概念,却一直未能引起充分展开研究,直到近年才有一些变化,出现一些研究成果。<sup>27</sup>

前世界体系存在另外一种国际的“社会空间”,将民族国家置于各种不同社会(地域社会)的相互依存的大格局之下。珍妮特·阿布指,13~14世纪存在另外一种多元体系,包括西欧、中东和远东三个中心区,三大中心地区均衡发展,不存在一个霸权性的世界体系。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蒙古征服者、中东和埃及穆斯林,印度和中国的商人的贸易网络组成“亚经济体系”。那个体系崩溃之后,重组为世界体系,而现在的国家和社会还在这一次重组的余波之中。<sup>28</sup>

明代(1368~1644年)与世界体系形成期重合,也是朝贡体系的成熟期。15世纪,欧洲霸权尚未建立,金帐汗国的蒙古势力衰落并皈依伊斯兰,继之兴起的帖木尔帝国、奥斯曼帝国,形成伊斯兰的中心势力。伊斯兰势力控制海路,欧洲新兴国家只能另求生路,绕道非洲进入印度洋。欧洲需要亚洲的香料和丝绸等物产,香料和胡椒不仅作为肉食添加剂,而且有防治瘟疫的功能,不可或缺。<sup>29</sup>以后,欧洲势力开始驱逐伊斯兰,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可以看作朝贡体系扩张为全球贸易的标志性事件。<sup>30</sup>早在9~10世纪,伊斯兰势力开始进入新疆,佛教

---

<sup>27</sup> 韩毓海:《五百年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

<sup>28</sup>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商务印数馆2015年。

<sup>29</sup> 欧洲人为了取得胡椒,展开一系列冒险乃至战争。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有一段话:“17世纪的商人到那儿寻找胡椒,大约是在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因为人们对于胡椒的喜爱就像一团爱的火焰一般,燃烧于荷兰和英国冒险家的胸膛中。为了胡椒,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去呢?为了一袋胡椒,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裂彼此的喉咙,并且抛弃他们的灵魂”。

<sup>30</sup> 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发现欧洲》,第一章,奥斯曼的勃兴和穆斯林史观,三联书店2013年。

的于阗政权曾与其长期抗争。成吉思汗征服新疆，对一切宗教一视同仁。1353年，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强迫库车等地的佛教徒改宗。到乾隆平定准噶尔（1757年）的时代，设立中央代表机构，依旧册封~朝贡，但比如在册封郡王统治之下的哈密，已是标准的伊斯兰政体。<sup>31</sup>

明初，朱元璋宵旰图治，以安生民，又扩大朝贡，实行海禁，有所谓“洪武之治”。穷和尚出身的洪武，对内励垦荒，徙富民，抑豪强，反腐败，重典治吏，剥皮梟首，对外行怀远之道。1369年（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编辑的《皇明祖训》将朝鲜、日本等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sup>32</sup>或有安定东南应对“北元”威胁的考虑。1370年，明廷在广州、泉州、宁波设立市舶司，广州应对南洋朝贡，诸如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满刺加（马来西亚）、真腊（柬埔寨）等；宁波应对日本，泉州应对琉球。<sup>33</sup>除了朝贡（官方）贸易，民间贸易被严格限制，“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sup>34</sup>还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办法。1389年（洪武二十年）汤和经略海上，废除昌国县（舟山），将居民内迁，反为倭寇提供“可巢”之地，而且“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疑其勾引而厉禁之，遂使民不聊生，潜逸而从盗矣。<sup>35</sup>再者，“禁绝海市，遂使势豪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则籍官府而

---

<sup>31</sup> 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章莹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

<sup>32</sup> 《皇明祖训》开列的不征之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瓜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尼（今文莱）、西洋瑛理（印度）。

<sup>33</sup> 李云全：《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第二章明代的朝贡制度，新华出版社2014年。

<sup>34</sup> 《明史》卷205列传第93：“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

<sup>35</sup>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四册，浙江备录下，黄珏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77~2478页。

欺海贼，并其货价干没之，以至于乱”。<sup>36</sup>

元顺帝逃回草原，仍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至1635年被满清势力征服。蒙古西部有瓦剌四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东部有鞑靼（塔塔尔），相互之间战事不绝并侵扰明朝边境。永乐曾征瓦剌，以后讲和并恢复朝贡关系。在中亚，蒙古后裔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兴起，扩张到阿富汗、印度、伊朗、叙利亚。1402年永乐登基，同年帖木儿大败奥斯曼帝国，也给拜占庭帝国50余年的喘息机会。<sup>37</sup> 1405年，帖木儿率军东征明朝，途中病死。有学者指出，郑和下西洋目的是海外结盟，牵制帖木儿。的确，帖木儿要联合其他蒙古旧部，停止朝贡中国，甚至伊斯兰化中国。但在他病死之后，帝国很快四分五裂，双方并未发生战争，牵制之说似难成立。郑和是穆斯林，他经泉州南下，辞别那里的穆斯林村落，至今留有纪念碑厅。1413年（永乐11年）撒马尔罕遣使来京，贡狮子犀牛等特产。永乐也派多人访问中亚，其中陈诚（1365~1457年）最知名，他五次出使，著《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其意义和郑和航海相同。1420年（永乐18年）中亚20余国使臣随陈诚来中国朝贡，参观各地。1421年（永乐19年）永乐在怀来狩猎阅兵，请各国来使观礼。据说明军实力令各国使节大惊，包括帖木儿使臣，永乐亲书致意帖木儿国王以示友好。

海上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李约瑟估计，1420年左右明朝的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他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永乐在位22

---

<sup>36</sup>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嘉靖中倭寇之乱”条，王树民校，中华书局2013年。

<sup>37</sup> 斯蒂文·郎西曼：《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马丁译，时代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16年。

年，中亚和南洋各国来贡 318 次，每年约 15 个使团。琉球国时常一年两贡，文莱、满刺加、苏禄的国王亲自来访，有三位在中国病逝。明朝的朝贡体系以往一样厚待贡舶，“薄来厚往”，在互酬中显示权力的上下等级。<sup>38</sup> 而且，贡使来华贸易的商品，往往特旨免税，由明廷高价收购，对关税收入不大重视。刺泥国来朝<sup>39</sup> 带来胡椒互市，有司请征税被皇帝所拒：“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sup>40</sup>

1453 年，奥斯曼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灭亡，欧洲各国震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惊醒了基督教世界，欧洲人用“当时世界的恐怖事物”来描述这一事件。1492 年，穆斯林败退西班牙，欧洲势力扩张到北非，并反攻东方。1571 年，欧洲盟军在勒班托海战中险胜，阻止了伊斯兰的欧洲扩张，但神圣同盟实际上依旧四分五裂，未能称霸地中海。至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还掌握在伊斯兰势力之下。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船队另辟航路，通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打开连结印度、印支半岛、菲律宾和中国的商路。到 17~18 世纪，欧洲势力才在军事革命之后强盛起来。

明中后期的朝贡贸易演化为“勘合贸易”，<sup>41</sup> 规定外国来朝的时间地点、船数人数，事先提供“勘合”，统一收购贡品，贡期或二年、三年、十年，如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琉球，入泉州港，二年一贡，毋过一百人，占城、真腊、暹罗及

---

<sup>38</sup>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赠与交换伴随权利，厚赠意味对被赠与一方的支配，如氏族社会有夸富宴的习俗。

<sup>39</sup> 对音可能是 Jilani，今伊朗西北的吉兰省。参考陈尚胜：〈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一文，《文史哲》2007 年第 1 期。

<sup>40</sup> 《明史》卷 81，〈食货五〉。

<sup>41</sup> 即执照。明初为防止官员滥用驿站，朝廷启用勘合制度，无证明不可用驿站马匹。也有人用钱买勘合用马。



西洋诸国入广州港，三年一贡”。勘合有谨防假冒和限制的意义，因为朝贡贸易很赚钱。各国的方物，到了中国成珍贵贡品，而中国的一般货物，到了国外成贵重奢侈品，贱买贵卖，获利颇丰，故外国商人趋之若鹜。比如，1404以后中日之间贸易船只，以“勘合符”为证。1411年足利义持当政，勘合贸易一度停止，1429年足利义教恢复了中断十余年的贡舶。日本的出口品主要是硫磺、铜、刀剑、漆器；进口品主要是永乐通宝、生丝、纺织品、书籍、这些对室町文化有相当的影响。1523年（嘉靖二年）宁波发生一次所谓“争贡事件”。当时日本东部的细川氏和西部的大内氏主导朝贡贸易，各自派“遣明使”。细川氏的代表宋素卿（宁波人，翻译）贿赂了市舶太监，使其厚待细川氏而轻慢大内氏，导致两家商人之间相互杀戮，并伤及宁波百姓。明朝废除福建、浙江两地市舶司，仅留广东一处，与日本的正规贸易途径断绝，而倭寇滋生。1554年倭寇劫掠苏州和松江，朝廷调兵平乱，1560年戚继光驻守台州。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请重开市舶，“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朝廷下旨“隆庆开关”解除海禁，民间海外贸易方获得合法地位。

室町时代的日本无铸币，永乐通宝广泛流通，东南亚的情况类似。“15世纪以前，东南亚大陆似乎没有以铸币货币来促商业的发展……1400年以后，中国的铜钱及其在本地的仿铸钱，是东南亚地区日益繁荣商业化的最基本的润滑剂。Cash一词源于梵文，但葡萄牙人将其写成caixa，用来表示进口的中国铜钱”。<sup>42</sup> Caixa即“制钱”，葡语语源如此，现在还用于巴西的储蓄银行。日本的“战国时代”（1467~1615）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号称“三杰”，织田结束室町幕府政权，丰臣完成日本统一，德川建立江户幕府的长期安定政权。有意思的是，

---

<sup>42</sup>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第二卷，第二章城市与贸易，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第 131~158 页。

目空一切的织田信长的军旗“旗印”居然是“永乐通宝”。

亚洲朝贡体系时代，欧洲缺乏商品，只能以白银货币介入国际贸易，所谓“中国需要白银，欧洲需要商品，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品扩张”。<sup>43</sup> 布罗代尔更具体地指出，胡椒、丁香和肉豆蔻的贸易，直接促进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美洲的白银有两个渠道流入中国，一个是经由马尼拉，一个是经过欧洲。白银流入欧洲之后曾造成对黄金比价的下降，这有利于自由贸易。“从1550年到1680年，由于美洲的银矿采用现代技术（汞齐法），白银产量激增，从而成为持久的、强大的通货膨胀的动力。”<sup>44</sup> 1493~1600年，世界白银的总产量大约2.3万吨，美洲为1.7万吨，大约70%流入欧洲，其中的40%流到亚洲，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估计有五千吨，约为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经马尼拉的美洲白银，是中国进口另外一个的渠道。1550~1645年，一百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4万吨，约为中国自产白银的十倍。<sup>45</sup> 明朝的租税和官俸皆用白银，所谓“白银货币化，财政白银化”，刺激了中国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繁荣。

1499年，葡萄牙侵入印度洋，曾劫掠穆斯林船队。马六甲是郑和航海基地之一，朱棣册封其首领为“满喇加王”，马六甲脱离暹罗，朝贡明朝。1511年，葡萄牙打败印度，进军马六甲，苏丹抵抗了十几年，1526年败落。以后马六甲又被荷兰人、英国人征服。1553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脚，采购中国产品，参与亚洲的白银贸易。在17世纪的欧洲文献中，日本的白银称为“Soma 銀”。当时日本白银产地是“石见银山”，那里有个叫做“佐摩”（samo）的村落，日本白银可能因为那

---

<sup>43</sup>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序言，刘北成译，中国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

<sup>44</sup> 布罗代尔：《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46页。

<sup>45</sup> 陈昆：〈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为何大量流入中国〉，见《中国经济史论坛》。

个村落而得名。西班牙人来到东亚，西属美洲银矿的开采使其实力大增，西班牙银元成为东南亚的国际通货。实际上 1401~1547 年间日本的“遣明船”，货物也是白银，日本叫做“秤量银货”。1533 年“石见银山”引进“灰吹法”技术，<sup>46</sup> 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在 16 世纪后期的世界白银产量中，日本约占三分之一。在民间贸易非法时代，“唐船”（中国船）上常有银匠和熔炉，得日本银后即熔化使用。日本白银大部分流入中国，有些通过东南亚间接流入。日本自己也改变过去几百年使用“渡来钱”（中国钱）的局面，货币改变为金、银、钱（铜钱）的所谓“三货制度”。

亚洲的商品流入欧洲，新世界的白银流入中国和亚洲，这样一种东西方贸易，刺激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安东尼·瑞德指出，如果要寻求贸易时代的起点，1405 年的郑和下西洋才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sup>47</sup> 从西方视角来说，世界贸易诞生于 1571 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无论如何，15 世纪东西方的航海家们开阔了世界，并将这个世界连结起来，但动机和结果有着明显的区别。布罗代尔说过，“从市场变为殖民地，只差一步的距离”，中国人很早就东南亚经营市场，而不是殖民地。他还说：“只要被剥削者不那么驯服，武力征服随之而来”，欧洲的“西风东渐”就是如此。民族国家的新文明使得他们占据优势，“重组”了这个唯一的亚洲体系，使中国~周边朝贡体系“历史终结”。

---

<sup>46</sup> “灰吹法”的由来有“中国由来说”和“朝鲜由来说”。前者见田中健夫的《中世海外交涉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59 年；后者见小叶田淳的《日本鉱山史的研究》，岩波书店出版 1968 年。

<sup>47</sup>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第 2 卷，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 四、朝贡体系之前传统的“一带一路”

15~18 世纪的朝贡体系之前，中国~周边早已存在着在战争和和平中发挥协调作用的朝贡。古代中国是开放的，且有陆地和海洋之别，所谓“北马南船”。汉朝立国 60 余年以后，汉武帝（前 140~87 年）平定天下，“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sup>48</sup> 奠定了多民族共同体的版图。朝贡是另外一个形式，用以联系周边邦族，互通贸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sup>49</sup> 名字叫做“纳贡”，实际上也是互惠贸易。比如乌孙、大宛贡“西极马”、“天马”，实际上开启中亚民族的马和中原产品的贸易关系。武帝尚武崇马，从张骞那里得知并亲见西域良马，名之“天马”。马是国家武备要素，战争要依靠骑兵。余英时指出：“汉胡交往的主要的形式：‘贡品’与‘帝国的礼物’的贸易。和亲政策实施中的汉~匈关系的不平等和匈奴持续增加的经济索求以及和亲政策，并不能保证汉朝边境的持久安定，这导致了汉廷不得不在武帝时期采取武力反击，最终在汉宣帝时期南匈奴归顺汉朝，汉廷成功的将匈奴纳入贡纳体系之中”。<sup>50</sup>

汉匈战争和纳贡的一个结果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公元前 140 年，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试图联合被匈奴驱逐到中亚的大月氏。他的出使凿空西域和中亚，与各国建立邦交，奠定了丝路的基础。张骞第一次出使，到过大宛（今乌兹别克），康居（今哈萨克），大夏（希腊 — 巴克特利亚，即“吐火罗斯坦”）。公元前 119 年，他第二次出使乌孙，派遣副使分别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波斯）、身毒（印度）、黎轩等地。东汉初年，匈奴强盛，朝贡中断，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遣使朝

---

<sup>48</sup>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一，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 1984 年。

<sup>49</sup>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

<sup>50</sup>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贡。公元 97 年，班超平定西域，“50 余国纳贡内属”。班超任西域都护，派甘英出使“大秦”：“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sup>51</sup> 后世读来遗憾，甘英被安息船人所骗。汉的丝和丝织品与罗马的交易，通过安息这个中间商，为了商业利益，他们要阻止甘英直接联系“大秦”。

关于“条支”地望，《史记·大宛列传》称“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这个“西海”当即地中海、“条枝”当为罗马行省叙利亚的安条克（Antakia）。在图拉真时代（公元 98~117 年），叙利亚在罗马行省中最为繁荣，甘英出使的时间与此接近。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西海”为波斯湾或里海。“黎轩”的地望，从夏德到余太山考证颇多。据余太山考证，“黎轩”是托勒密国首都亚历山大“〈A〉lexun 〈ria〉”的缩译，<sup>52</sup> 夏德《大秦国全录》<sup>53</sup> 则说，地中海东岸有一港口叫 **Rekem** 或 **Rekam** 是“黎轩”的由来，那里是通往罗马“大秦”的一个港口。无论如何，“条支”和“黎轩”，大约在塞琉西（中心在叙利亚）和托勒密（中心在埃及）地界，当时属罗马帝国。直至 16 世纪，中国人一直称罗马为“大秦”。《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海西或者西海有地理坐标所产生的差异，<sup>54</sup> 但各种考证说明汉代中国人的足迹已达地中海东岸。

秦统一之后发动了对百越的征服，建立南海等郡，秦汉之际有著名的赵佗叛而归汉的故事。其中“象郡”涵盖现在的越南北部，所谓“日

---

<sup>51</sup> 《后汉书·西域传·安息传》。

<sup>52</sup> 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第 21 页。

<sup>53</sup> 夏德（F Hirth）：《大秦国全录》，大象出版社 2009 年。

<sup>54</sup> 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南之地”成为海上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之一。不过，海上贸易似在东汉之后才真正发展起来，并延伸到印度洋。罗马和中国的海路交往，通过安息、天竺：“与安息天竺交布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sup>55</sup> 这里的“大秦王安敦”，大概是罗马第15代皇帝安敦宁·庇乌斯（Antoninus Pius，公元138~161年在位），或者第16代的马可·安敦尼（Marcus Antoninus，161~180年在位），两位“安敦尼”，皆为罗马史上的“五贤帝”，后者是著有《沉思录》的“帝王哲学家”。这是中国与罗马通过海路交往的最早记载，来者可能不是使臣而是商人。中国与东海日本的交往，最早见《汉书》（公元57年成书）：“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据《后汉书》记载：“桓灵之间（桓帝147~167年，灵帝168~188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于是共立为王”；《三国志·魏书》关于倭的海路和邦国的记录，更是日本古史的基本史料。

不论是陆地还是海洋，贸易的主要商品是丝绸，黄金通货也开始形成。“在亚欧大陆丝绸贸易体系中，没有一个大国和民族能够控制丝绸贸易的全部环节，中介国家和民族可以凭借其地利和地域优势，靠丝绸贸易敛财。因此，亚欧大陆丝绸贸易是建立在军事政治实力之上的‘脆弱’贸易……黄金是亚欧大陆丝绸贸易的硬通货……从公元四世纪开始至六世纪末，中国河西地区成为西域商胡进行丝绸贸易的重要地区。北魏占领河西后，西域商胡大批地来到中国内地（如洛阳等大城市）进行丝绸贸易，大量黄金也随之流入洛阳等地”。<sup>56</sup>

---

<sup>55</sup> 《后汉书·西域传》第78，〈大秦国〉。

<sup>56</sup> 张爽：〈公元前3~公元六世纪亚欧大陆丝绸贸易〉，<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00-2010024185.htm>。

到唐宋之后，中国~周边的交往史料众多，其盛衰起伏，大抵与朝代的兴衰同步。唐宋以后的各朝代，在沿海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时间长达上千年。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广州设有“市舶使”，由宦官主管。阿拉伯人的《苏来曼游记》成书于851年，<sup>57</sup>记录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情况，远早于马可波罗。穆斯林先知指示：求知是穆斯林的天职，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种欲望加之地理优势，使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交往领先欧洲。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穆罕默德曾派四个门徒来华，一贤在广州，二贤在扬州，三贤、四贤在泉州，死后葬在泉州，至今犹存灵山墓地。泉州一带伊斯兰村落众多，丁、郭等大姓为伊斯兰后裔。

971年（开宝4年），北宋在杭州、明州（宁波）、泉州市等地设市舶司，一直延续到南宋。宋的造船技术发达，指南针用于航海。泉州展示有1974年出土的宋船遗存，考证为“蒲家”之船。<sup>58</sup>在南宋史料中，大船可容数百人，存海上航行一年所需食物和水，甚至可养猪、酿酒。“南海一号”的海下考古，进一步提供了实物证据。<sup>59</sup>与宋往来贸易的国家多达50余国，数百种货物，进口主要是香料（以后香料在中国热带地区种植）、特产等，出口主要是丝织物、陶瓷。宋瓷水准高超，名扬海外。到了元代，海外贸易往来一百余国，物品繁多。<sup>60</sup>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皆发明于宋代。对这个所谓“天水一朝”，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入，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

<sup>57</sup> 《苏来曼游记》又名《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

<sup>58</sup> 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

<sup>59</sup> “南海一号”为南宋时代的古沉船，沉没于广东阳江东平港以南20海里处，1987年被发现。船长30.4米，宽9.8米，高约4米，排水量可达六百吨，载重八百吨。推测这艘古船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或中东进行海外贸易。发掘文物则证明始发港为泉州。

<sup>60</sup> 黄纯艳编：《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sup>61</sup> 印刷术传入欧洲，教会和王室对宗教和思想的垄断被打破，可以说“现代世界的首次民主革命”，直接导致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sup>62</sup>

以日本为例来看，从平安时代（794~1185 年）到镰仓幕府（1185~1333 年）时代，所谓的“宋日贸易”很兴盛，而且，宋钱在日本广泛流通。平氏政权（1160~1185 年）进口宋钱，以平衡财政，其他藩阀反对使用宋钱。平氏政权败亡之后，镰仓幕府曾考虑禁用宋钱，终究未能实现。因为，民间贸易加速了宋钱流通，而缴税也用宋钱。1226 年，日本正式承认宋钱的法定地位。一直到室町时代（1336~1573 年），日本没有自己的铸币，宋钱和明钱一起流通。日本的“遣明使”曾要求明朝使用宋钱交易，造成不少麻烦，可见其影响之深。宋钱也曾流通于金、西夏、东南亚各国乃至波斯，各地都出土了不少宋钱，有些是明朝的仿铸。“宋日贸易”延续到南宋，1276 年蒙古军队进攻临安（杭州）时，日本商船才从明州（宁波）撤离。

蒙古帝国是一个欧亚帝国，蒙古的马上征服所向披靡，海上征伐却屡屡失败。忽必烈当了中国的皇帝，要求周边朝贡和平，1268 年和 1271 年派使臣赴日，遭镰仓幕府拒绝。1274 年元朝 150 艘战船，从朝鲜半岛出发远征日本，在九州登陆激战，以失败告终。1281 年，4.5 万蒙古人和 12 万高丽人、中国人再次远征，还是在九州登陆，仍被击退。8 月 15 日一场“神风”吞噬了蒙古军队的舰船，征伐失败。<sup>63</sup> 元代的中日贸易关系并未因战争而断绝。1976 年，在韩国新安郡附近海域发现

---

<sup>61</sup>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 年。

<sup>62</sup> 玛丽·伊万丝：《社会简史：现代世界的诞生》，第一章，曹德骏、张荣安、徐永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sup>63</sup> 勒内·格鲁赛：《草原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元代沉船，里面有大量的瓷器和铜钱。元朝对日本商船征税较高，态度不佳，引发日本的武装抵抗，这也是初期“倭寇”的起因之一。

室町时代 237 年间有 60 年为“南北朝”，南部北九州一带为中日来往门户，由怀良亲王控制。1369 年，太祖遣使日本要求朝贡，怀良杀了来使；1370 年，再派赵秩出使，怀良称不怕再一次的“蒙古袭来”。元朝当年使臣是女真族的赵良弼，赵秩解释自己是大明使者，此赵非彼赵，还带回 15 名日本僧人，怀良这才改变态度，派遣僧祖出使明朝，奉表称臣，贡马和方物，明朝封其为“日本国王”。明清之际，江户幕府拒绝朝贡清朝，收留明朝遗民，并采取锁国政策，只留下长崎出岛与荷兰、中国贸易。17 世纪日本船不来中国，每年有几十条中国船到长崎。台湾回归之后的 1684 年（康熙 23 年），清廷开放海禁。1688 年。193 艘中国船到港。1723 年，中国商人还第一次将大象运到日本，轰动一时。18 世纪中国对日本最大的需求是铜，官府限制私商经营，官商主导对日贸易。<sup>64</sup> 对日本来说，和清朝变相的朝贡贸易，对其经济发展和连接南洋各地意义重大。

## 五、朝贡体系的深层：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形式

中国历来称“社稷”“天下”，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尚书），也有谓“诸侯封国，卿大夫治家”，“家”与“国”两个概念，在其之上为公的“天下”。严格来说，近代社会所使用的共同体、国家和社会皆为西方概念。滕尼斯（1855~1936 年）提出“社区和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的经典区分，<sup>65</sup> 前者指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可以译为“社区”，也可译为“共同体”，后者指则利益和功能

<sup>64</sup> 大庭脩：《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 1997 年。

<sup>65</sup>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关系的“社会”。笔者早期的社会研究，一直使用他的“社区”概念，而非共同体。在这个区分背后，还有一个隐蔽的“精神共同体”，即文化共同体。西方的国家概念更复杂，主要有共同体论和社会契约论。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1532年）中首先使用了国家（state）概念，指拥有领土的主权政府。以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霍布斯在战乱中写作的怪物“利维坦”，洛克、卢梭的契约国家，康德的伦理共同体，马克思关于资本社会的抽象的共同体，一直到今天市场和国家、自由和统治的争论。简言之，共同体（“社区”）和国家（“社会”）本来是对立的，共同体国家则意味着前者的平等与后者的强制性的结合，文化则是结合的精神力。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将现代社会看作资本、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从交换样式研究世界体系的构造。在他看来，国家是一个能动主体，不单由经济基础、生产方式所决定，广义的“交换样式”决定资本、民族、国家的变迁。“交换样式”可分为四个类型：A、互酬（赠与和还礼），B、掠夺和再支配（支配和保护），C、商品交换（货币和商品），D、未来的混合型 X。相对应的是社会组织是：A、民族，B、国家，C、资本，D、X。所谓 X 型，是指未来社会向 A 互酬的回归，并超越资本~民族~国家。柄谷受到汉娜·阿伦特哲学的影响，试图以康德的“世界共和国”重构形而上的共产主义，以“共同主义”（Associationism）的自由协作代替资本和国家的支配。<sup>66</sup> 他的三个实存类型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相互关系错综复杂，比如互酬也涉及到权力，商品交换之中无法离开国家的力量。

以他的交换类型来看，中国~周边的交换关系是混合的，互酬、支配~保护、商品交换共存，权力和伦理渗入其中，构成一种特殊的共同

---

<sup>66</sup>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

体。与欧洲的民族国家相比较，或可称之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形式。而任何一种“交换样式”皆可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

## 古典的朝贡与国家

中国者，周边之中国。在传统中国的世界观中，华夏和周边皆为天下，而且这个天下可以不断扩大。中国~周边关系，朝贡制伴随始终。这种制度非常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是王者氏族和其他氏族，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模式。《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从下献上”的贡，意味着存在有上下关系的王权，而交换方式则是复合的，即有支配和保护，也有互酬的赠与和还礼。

中国既是一个单数，也是一个复数；华夏不是一个氏族，而是一群氏族，一个族群。“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为“天下之中”。<sup>67</sup>“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sup>68</sup>地域概念的中国由此而来。与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民族一样，华夏诸族定居于河洛之间，成就了农业革命。多样的氏族共存，联合而成邦盟国家，这些族邦的同质性可能远大于差异。<sup>69</sup>夏代“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异姓族邦奉夏为天下共主，而且“虞夏之时，贡赋备矣”，<sup>70</sup>“贡赋”为结成邦盟国家的要件之一。<sup>71</sup>

---

<sup>67</sup> 《史记·货殖列传》。

<sup>68</sup> 《吕氏春秋·慎势》。

<sup>69</sup> 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文化异同〉，《中国青铜时代》，三联出版社 2013 年，第 43~70 页。

<sup>70</sup> 《史记·夏本纪》。

<sup>71</sup> 李学勤主编，詹子庆著：《夏史与夏代文明》，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殷商本来是周边族邦，或起源于易水（“有易氏”），发展于渤海周边，<sup>72</sup> 属“涂山会盟”对夏禹“执玉帛者万国”之一。夏代末期“桀为暴虏，诸夷内侵”，殷族邦“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周边而为中国邦盟之主。伊尹制定《四方令》，据《逸周书》记载：“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而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sup>73</sup> “易得而不贵”，不以价值为度，贡赋主要成为一种礼仪，赏赐随之。到殷商时代，周边扩大，甲骨文可考的族邦（方国）达到 1100 余个，并有“方”“侯”“伯”的等级称谓。

周代商的过程与此类似，作为周边族邦，周族从东方远徙西部，在西部兴起，武王伐纣，以周代商。周朝的中国~周边有所谓“畿服体系”：君主是“内服”和“外服”的天子，直接统治只限于“内服”，诸侯则统治“外服”。“内服”和“外服”相互保护，由内及外。这个体系细化为“五服”、“六服”、乃至“九服”，规定各个“服”的贡期和贡品，朝贡关系成为周朝礼制的一部分。秦汉之前的“封建中国”，实质内容是周天子和诸侯朝贡~分封的共治。到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仍享受朝贡，但诸侯国一旦作大，如秦穆公打败了晋国，一些小国也向秦国朝贡，朝贡体系成了“两属制”。这个形式还扩大到周边国家，比如 19 世纪的琉球的朝贡中国和日本。

从氏族社会到国家，是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普遍过程。国家既有强权支配，也有抑制战争冲突的公共性。中国古代通过册封朝贡，建立起多民族的天下国家，从殷周封建的天子与封国，到秦汉之后的册封朝

---

<sup>72</sup> 用翦伯赞之说。翦氏依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推测远祖王亥游牧于易水流域，见《先秦史》，第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此说在考古中有证，见王震中著：《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sup>73</sup> 《周书·王会》汤问伊尹。

贡，这种形式一直连续。在世界各国历史之中，朝贡关系（拉丁语：tributum）广泛存在，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周边，也以贡赋求奴隶的赎身与和平。但是，在非单纯武力、文化共享的含义上，中国~周边“东亚世界”的汉字文化圈最为典型和长久。此外，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等的著述指出另外一个关键，中国不是欧洲的民族国家，而是农耕文明和周边游牧力量在对立之中的一个共同体。对立的是生活方式、民族、语言的差异，而非宗教。中国不排除其他的信仰，对于异教、异族的外藩，只取“羁縻”之策，和平共存。最后，中国~周边并不固定，从周边而中国，从中国而周边，也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中国文化从中心到周边的渗透、推广和吸收，从语言到礼仪。反之，周边民族也可能归附、内附乃至入主中原，“夷狄亦中华”。秦汉之后，东方的朝鲜，南边的越南，东海的日本，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化”，包括文字、儒家经典和律令，构成一个“东亚世界”。<sup>74</sup> 明代日本的贡舶，大量采购中国典籍，特别是宋版书籍，并刺激了江户时代儒学的兴盛。北方、西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国的互动交往，时而和平，时而对抗。在各族的神权信仰之外，游牧政体需要一种世俗的权威赋予，文化共同体的朝贡册封，也满足了农耕和游牧两方的要求：权威的赋予和平贸易。两方面皆有交换需要，中原的农作物和丝绸，游牧民族的马和毛皮。而以“汉匈关系”为标志（匈奴朝觐纳贡，汉朝册封赏赐），朝贡和册封成为定制。<sup>75</sup> 汉朝定制，不意味汉朝发明了朝贡制度，它只是继承了先秦传统。

---

<sup>74</sup> 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 1993 年，第 88~103 页。

<sup>75</sup> 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第 14 页。

## 文化共同体的演变

何以中国有如此漫长而延续的朝贡制度？这个“形而上”问题，涉及民族、国家、文化等社会史诸问题，首先是文化共同体的“发生学”。文化共同体的起源甚早，历经统一和分裂，聚合和叛离，其本质未尝改变。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指出：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决定的。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sup>76</sup>等话题，并将其起源追溯到18~19世纪的“根本性议程”（下面还将涉及他的这个概念），而如果将文化共同体加入国家的演变，现代国家的历史基因或可追溯更远。

关于国家起源，考古界有所谓“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的理论。张中直推介此说，并用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史：旧石器时代为“游团”，仰韶文化时代为“部落”，龙山文化时代为“酋邦”，三代到春秋晚周秦汉为“国家”，<sup>77</sup>还有所谓“都市国家”或“邑制国家”的假说，<sup>78</sup>以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希腊语的polis，即city state）为比较对象，认为中国与希腊古代城邦一样，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国家。乡、亭所拥有的城郭，或为古代国的遗迹。<sup>79</sup>三代邦国林立，夏禹时或有万国，殷初有三千国，周有1773国，春秋1200国，渐次减少。马来语中的城市和国家中都是“negeri”，来于梵文意为“城市”，现代印尼语和马来语是“国





---

<sup>76</sup>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三联书店2013年。

<sup>77</sup>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

<sup>78</sup> 松丸道雄：《殷周国家的构造》，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

<sup>79</sup> 官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2年。

家”。<sup>80</sup> 甲骨文的“国”为 (戈，武力) +  (口，邑)，象形以武力保护城邑；“鄙邑” (口，邑) 表示聚落，意为居住和耕种的村野，“社”字甲骨文同“土”字，作“”，或源于生殖崇拜。“凡邑，有宗庙先君之社”，一般设于高丘，为社稷坛的原型。“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聚”“邑”“都”，皆为血缘、地域的共同体。在各个城邑，农人白天出城耕作，晚上回城生活，并从事祭祀和社会活动。不论是农业革命还是产业革命，都是先有聚落、城邦或城市才能发生，资本主义也在城市（民族）国家推动之下形成。

距今 5000~7000 年仰韶文化（“部落”）遗址从东到西二千余处，与黄帝时代相近。《史记》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据说兴于黄帝，衰于颛顼，<sup>81</sup> 或为“有熊氏之墟”。20 世纪初的白鸟库吉、顾颉刚有疑古之说，晚近考古反证古说为真。《尧典》说，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九族”为嫡系，“百姓”为近亲，“万邦”超氏族的联盟，尧为联盟共主。陶寺遗址与文献的“尧都平阳”相合，属龙山文化（“酋邦”），存在宫殿建筑遗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前 2400 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 2000 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sup>82</sup> 张光直认为，三代属于同一发展阶段，三大氏族比邻而居，介于部落与帝国之间的王国阶段。<sup>83</sup> 商周国家遗迹和文献可寻，难的是夏代。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距今约 3800~3500 年）为夏商两代的都城遗址，上古东亚最大的都邑，但没有

---

<sup>80</sup>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第 2 卷第 2 章，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sup>81</sup> 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sup>82</sup> 李学勤：〈舜庙遗址和尧舜传说〉，《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 年 8 月 20 日。

<sup>83</sup>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 年，第 73~74 页。

文字，无法确认是否为夏。许倬云认为，殷商可以看作一个主轴的政治力量，却未能开一个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真正的文化国家是周：“因为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王朝则不同，实际上是一个超越诸部族的大联盟，一个文化的共同体。<sup>84</sup>从“城邦国家”发展到周代的“畿服体系”，成就了文化共同体的原型。

秦统一天下，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天下帝国”。<sup>85</sup>秦以武力征服各个封建王国，似无任何正当性，史称“暴秦”，却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精神，车同轨书同文，开辟了回归周代文化共同体的途径。春秋时代，墨家、儒家、纵横家都是“国际派”，周游列国的目的是平定天下，而非一个城邦国家。钱穆认为，除屈原和韩非之外，战国时代的知识人，绝少抱着狭隘的国家观念。<sup>86</sup>在分封和郡县之间，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在中央集权之下皇权和治权分离，顾炎武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秦二世而亡，其亡在政，在用人，而不在制。秦统一后，周边仍存在封国，西汉也有宗室功臣的封国，东汉初年，曾封“宗室与绝国封侯者凡 137 人”，再封“功臣，凡 365 人”，<sup>87</sup>可知“封邦建国”传统惯性。郡县之下诸侯权力受限，封地相当于食邑，贵族不可参政；官员由中央选派，是国家公务员而非贵族家臣；基层社会是邑、里、亭，与古制相合。郡县创设之初，外来官员和乡里可发生冲突。高祖当年以一亭长身份杀了县官，号令乡里父老反秦，这和贵族项羽的反秦出发点不同。既然存在分封自然会有世家门阀之弊，东汉以后，门阀

---

<sup>84</sup> 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 1994 年。

<sup>85</sup>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共同体》，第四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sup>86</sup>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三章，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第 39~45 页。

<sup>87</sup> 《后汉书》，光武帝本记第一。



势力强大起来，造成长期的国家分裂。<sup>88</sup> 郡县还是封建，关系到国家治乱，其是非功过自古争辩不绝。船山经典《读通鉴论》开篇就说：“两端之争，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辩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其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矣”。<sup>89</sup> “私天下之心”指皇帝的郡县官僚，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又超越了“私”的范畴。

郡县之外的周边还是册封朝贡，所谓“盖闻天子之牧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考三代之于荒服，羁縻之而已”。中国~周边是农耕和游牧混合的共同体，周边众多的游牧民族，疆域模糊，并一直延伸到内亚大陆。拉丁语的“文明”（Civis）即是“公民”也指定居城市，日本人译作汉字的“文明”。从罗马来看，其文明的周边最多到中央欧亚大陆阿姆河，此河之东岸以东就成了“蛮荒”之地。中国的定居文明独立发展，并以朝贡册封扩大周边，对诸多的周边的民族政权，一概采用“羁縻”政策，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不干涉其内政。西方的东方国家观，却一无是处，最多是“东方专制主义”。和启蒙时代推崇中国文化的思想家不同，19世纪之后欧洲的中国观大变，当与清朝的衰败有关系。黑格尔说中国没有个性和哲学，孔子的国家哲学只为帝王服务，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所谓“帝国主义是一个东方的概念”，可能源于这种中国观以及古代波斯帝国的形态。<sup>90</sup> 实际上，世界性的帝国主要在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发展为19世纪海外殖民的帝国主义。而且，后来的帝国，不论“众神教”、“主神教”还是“一神

---

<sup>88</sup>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2章门阀政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sup>89</sup>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卷一，中华书局1996年。

<sup>90</sup>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三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教” (one god) ，都试图将自身宗教“普世化”。<sup>91</sup> 秦汉以来中国所谓“天下帝国”，并非那种意义上的“帝国”，没有海外殖民和总督，最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且无宗教因素。

文化共同体的一个基本逻辑是，每逢一个王朝兴盛，周边宾服；每逢一个王朝走向衰败，则周边叛离。古代如此，中世纪的唐朝也如此。唐在当时世界是发达的、国际化的朝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最盛期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南到越南，北到贝加尔湖，面积达 1251 万平方公里，包罗众多周边民族。“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sup>92</sup> 李唐皇族本身为贵族，且“源流出于夷狄”，并引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为李唐一代史事关键所在。<sup>93</sup> 当时西域胡风成社会时尚，波斯、西域的建筑、饮食、音乐盛行天下，<sup>94</sup> “胡人华化”。<sup>95</sup> 唐的兴亡和周边密切相关，周边藩镇的安史之乱，摧毁了唐朝基础。五代十国之后，事实上延续了唐末的割据，而且西夏和交趾的叛离，也反映当时朝代的兴盛与衰败。

宋朝视西夏交趾为“汉唐旧疆”，王安石变法，试图富国强兵，却无力恢复到汉唐之盛。<sup>96</sup> 内藤湖南的“唐宋之变说”着眼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而不在与汉唐比较国力强弱。他认为，唐是中世的结束，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则意味着进入平民化、世俗化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平民成为社会主体。对唐宋的社会

---

<sup>91</sup>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欧洲》，第三章：主要宗教和社会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sup>92</sup>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狄传》。

<sup>93</sup>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sup>94</sup> 向达：《唐代长安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sup>95</sup>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

<sup>96</sup> 黄纯艳编：《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变化，中国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载，顾炎武曾言，“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但历经战乱之后，唐以后的社会“田亩转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日本从周边研究中国，加之比较欧洲史，善于发见细节，并提出独到看法，“唐宋之变说”也如此：“内藤假说中的某些观点虽经后世学者的修正，补充和提高，而它所勾画的总的轮廓，……仍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sup>97</sup> 此论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提示了中国独特性历史中具有的世界史的一般意义。

从贵族制到君主制，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之一。贵族为欧式称呼，中国称为“门阀”或世家大族，主要是官僚世家。宋之后“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在经济和文化上：“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sup>98</sup> 此说提出之时，正当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方向发展，国家体制备受关注。钱穆看法相近：“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

---

<sup>97</sup>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一章 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sup>98</sup>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 1992 年，第一卷，第 11~18 页。

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sup>99</sup>

韦伯社会学有支配类型说，将中国归于“传统的支配”，以“世袭官僚制”概念（*patrimonial bureaucracy*，日译为“家产官僚制”）来描述；与之相对的是近代官僚制，即“法制官僚制”（*legal bureaucracy*），代表理性的、法制的权威，也是“现代性”的核心之一。<sup>100</sup> 唐宋之际，支配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古代的任官制度，确具有所谓“世袭官僚制”的色彩，即“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城邦为了富国强兵，已破格任用庶民。如秦国有“军功爵制”，奖励耕战，“辟田”和“军功”皆可任官。汉代的任官制度为“察举制”，自下而上地推选任官。东汉之后，门阀士族操纵和利用推选，使“察举制”弊端丛生。三国时代回归贵族任官，所谓“九品中正制”，并被魏晋南北朝继承。隋唐以后，门阀势力衰落，恢复举贤良和“试策”选官。科举制逐渐普及，开辟了平民的政治参与之途，一直延续到1905年。

“一般而言，欧洲的近世史是指文艺复兴以后；但试图否定东洋近代性的论者，却将近世特别严密界定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或资本主义隆盛时的欧洲。假如将公元1300年定为文艺复兴的开始，其后经二百余年，发生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变得更加富有近世色彩。制纸、印刷业大盛，火药开始输入，航海术发达，国民主义勃兴，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成立。这期间的欧洲肯定不是中世而是近世。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和宋、元、明、清比较，共同称为近世，我不以为是失诸比例。”<sup>101</sup> 谢和耐称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指出，“11~13

---

<sup>99</sup> 钱穆：〈理学与艺术〉，《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联书店2009年。

<sup>100</sup> 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第11章，唐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

<sup>101</sup>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

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sup>102</sup>

17~18 世纪，明清之际的社会变迁，“资本主义萌芽说”流行多年。以长时段的历史观之，明清变革的源头在“宋代近世”，或者说宋为早期近代，明清之际为近代，大局或有相似之处，但发展途径与西方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不同。王船山有“孤秦”“陋宋”之说，直斥其在政治格局上的失败：“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私之”。<sup>103</sup> 余英时认为，“陋宋”是从政治史上讲的，而“宋分教于下，而道以大明”则是从文化史上讲。一个中庸的结论是，宋代在政治史上难与汉唐争，但在文化史上则有超越汉唐的成就。<sup>104</sup>

## “国家形式的议程”

回到孔飞力的那个社会史问题：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由其历史的演变所决定。他的研究“关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多种形式的存在。该书的中译者遇到一个困难，即“constitutional agenda”如何译成中国概念。这个概念包含政治参与，

---

<sup>102</sup>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sup>103</sup> 王船山：《黄书·宰制第三》。

<sup>104</sup>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 2004 年，第 189 页。

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等话题：“即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 constitutional 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 constitutional 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中译者经反复推敲，将这个词为“根本性议程”。<sup>105</sup> 在研究日本宪政问题时，笔者曾遇到类似的问题。“constitution”一词，被日本人译为汉字的“宪政”和“宪法”，参考《国语·晋语九》：“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这个译法其实只是狭义的，而广义的更确切的含义是“国家形式”或者“国制”。<sup>106</sup> 孔飞力探寻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当为“国家形式的议程”。

以欧洲发源的世界体系的“史期”“史型”及其史观概念来看中国，往往遇到这样的困难。中国的国家形式演变，难以找到民族国家及其帝国的对应物。西方有城邦~民族国家到帝国的历史传统，从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到近代的大英帝国和美国。<sup>107</sup> 而从中国角度来看，帝国是西方概念，除了蒙元帝国之外，古代中国王朝不是帝国。“宋代近世”之说肯定了东亚的近代性，但平民社会的国家不是民族国家，依旧是君主制的文化共同体。内藤湖南曾说，诸多周边民族，在中国文化的“盐卤”点化之下，成为民族国家的，<sup>108</sup> 如高句丽、三韩、和日本。15~18 世纪的朝贡体系，进一步带动了阿瑜陀耶（今泰国）、马六甲等

---

<sup>105</sup> 陈之宏、陈兼：《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同书中译者序言，三联书店 2013 年。

<sup>106</sup> 黄晓京：《方法的日本》，第二章，（香港）大风出版社 2011 年。

<sup>107</sup> 安东尼·派格登：《西方帝国简史》，徐鹏博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sup>108</sup> 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何谓日本文化”。商务印书馆 2014 年，中文版，第 1~14 页。

民族（城市）国家的繁荣。<sup>109</sup> 在文化共同体之中，既承认周边自主独立，又具备协调彼此的功能。比如，永乐册封马六甲的“满刺加国”，曾受到阿瑜陀耶的压制，明朝居中协调，劝谕对立各方和平相处，并且颇有效果。<sup>110</sup> 欧洲的世界体系，首先冲击中国的周边，变中国的周边为西方的周边。清朝是最后一个存在朝贡体系的朝代，其自身从周边而入主中国。清王朝继承了秦汉以来的国家形式，如雍正所言：“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sup>111</sup> 清中期之后，国运由盛而衰，出现一系列危机，虽曾试图介入英法对越南和缅甸的殖民战争，均以失败告，最终以朝鲜之乱为契机，败给“东方的西方”。清末民初试图建立欧美式民族国家，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动荡，“国家形式的议程”仍然没有终结。

汤因比指出，历史研究中“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人类全体，而代之以整体性的文明史或社会史。周边的中国及其演变的社会史，或许即是这样一个“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朝贡制度，发展为中国~周边的朝贡贸易体系，其背后是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形式。这种国家形式不具备现代性？只有世界体系的欧美式的民族国家才是唯一的现代性？所谓现代，只是现时代的存在，除了其被人赋予的那种既定论的形式，还涉及到历史的演进，涉及社会整体的发展和变革。如果将现代性只限定于欧美体系，其他地域比如中国~周边的现代则只能是外力下的转型，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只能是世界体系的附庸。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或可说明，不同的社会和国

---

<sup>109</sup>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sup>110</sup> 上田信：《明清时代海与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四章，第 150~151 页。

<sup>111</sup> 张志强：〈超越民族主义：多元一体的清代中国〉（[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10154.html](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10154.html)）。

家通过不同的道路走向现代，历史的内在力量造成多元的现代，中国~周边的变革过程也是如此。

历史是过去的现代，在方法论上可以是统一的。1914年第一次大战期间，汤因比自己曾遥想修昔底德而突然领悟到：“我们现时现世的所有体验，早已被修昔底德在他那个时代体验过了……无论年表如何表述，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已被证明，在哲学意义上是同时代的”。<sup>112</sup> 中国~周边的经济和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回归，或许再次证明这一点。

## 六、小结

本文是一个社会史研究的概略的开篇，旨在提出一个世界体系之下中国~周边变革的长期性问题，以朝贡体系的兴衰为主线，并涉及其深层的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形式。欧洲起源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三位一体”，在战争和征服中全球化，构成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当下这个体系面临整体性的变革，中国的复兴和周边有事乃至战争威胁，皆与这个历史性的变革相关，并预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酝酿之中。

15~18世纪，朝贡体系是历史上唯一的亚洲体系，为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素材。世界体系在“重组”亚洲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他们不是“发现”或者“创造”了全球化的贸易网络，那个网络体系历史上存在于亚洲。“宋代近世”或早期近代，以及发达的朝贡贸易体系，揭示了另外一个亚洲起源的近代。在世界体系扩张的19世纪以后，中

---

<sup>112</sup> 汤因比、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胡益民、单坤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8页。



国~周边朝贡体系瓦解，成为世界体系的边缘。近几十年来的变革说明，历史并未终结，虽然世界体系难以一下子被替代，但是过去的要素和规则，乃至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可能由于中国和亚洲的参与而被超越性地重组，过渡为一种多元的世界秩序，或表现为某种历史的回归。

国家形式的转型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历史终结”论者承认推行美式民主的失败，反思“历史终结”之后的历史，却没有找到新的摆脱危机的道路。中国的国家形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以民族国家的普世假设，在中国寻找欧美样式的“国家形式的议程”，往往只能得到似是而非的结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形式，是中国自身历史演化的结果，历经无数次统一和分裂以及近代以来的政体变化，而保持着自己的连续性，世界体系所“重组”的或许只是其表层结构。在19世纪结束了亚洲唯一的一朝贡体系，但中国国家形式的演进没有终结，其今后的演化也必将遵循自己的历史逻辑。

1904年，梁启超曾写下〈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他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世界体系之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条约体系，挟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威力，席卷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域，推动无边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产生“无量数的哥伦布”；而中国~周边朝贡体系和共同体国家从此衰败，“竟无第二之郑和”。这是周边的中国的“历史终结”，却也是新的历史开始。中国已经或将要来临的变革，必定指向重建文化共同体国家的方向。

## 参考文献：

巴菲尔德 (Barfield T.) : 《危险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 袁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柄古行人: 《世界历史的结构》, 赵京华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

《跨越性批判 — 康德与马克思》, 赵京华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

滨下武志: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朱荫贵、欧阳菲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波斯义信: 《中国都市史》, 布和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布罗代尔: 《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 三联书店 1992 年。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

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 《古代中国与其强邻: 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译, 凤凰出版集团 2011 年。

冯承钧: 《冯承钧译著集》, 共 11 种,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

冯承钧: 《中国南洋交通史》,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傅佛果: 《内藤湖南: 政治与汉学 (1866~1934) 》, 陶德民、何英莺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弗朗西斯·福山: 《大断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指秩序的重建》, 唐磊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弗朗索瓦·吉普鲁 (Francois Gipouloux) : 《亚洲的地中海: 13~21 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 龚华燕、龙雪飞译, 新世纪出版社 2014 年版。

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第一、二、三卷, 纽先钟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葛兆光: 《想象异域: 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中华书局 2014 年。

巩珍著、向达注释：《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 2000 年。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三联书店 2011 年。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黄珣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顾炎武：《日知录》，岳麓书社 1996 年版。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黄省曾、张燮：《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东西洋考》，谢方注释解说，中华书局 2000 年。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二版。

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 2015 年。

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关水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李德谋、曾先令译，凤凰出版集团 2011 年。

雷蒙·阿隆：《历史讲演录》，张琳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

李学勤编：《西域历史地三种资料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 2014 年版。

马克斯·布特：《战争改变历史：1500 年以来的军事技术、战争和历史进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年。

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以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2011 年。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专题六讲》等张光直作品系列，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 2013 年第二版。

赵汝适：《诸蕃志校释》，杨博文校释，中华书局 2000 年。

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佐竹靖彦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 2008 年。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 — 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商务印数馆 2015 年。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